

读《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刘家和

石泉教授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40余年来对于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悉心研究的主要成果。为了探索楚史上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已读过作者的若干论文,此书出版后,又反复阅读数遍。我认为这是一部以深厚的功力写出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主要表现在:(一)发现了自唐初《括地志》以来逐步形成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传统说法中的矛盾,并以严密的考证突破旧说而建立起一个新的解说体系;(二)作者以严肃的求真精神与缜密的论证程序在治史方法上作出了一个好的范例。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一些个人的意见。

(一)

传统的关于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解释,历时已千余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解说体系。尽管其中的若干矛盾,前辈学者已予指出,并有所驳正,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经过长期的复杂过程而形成的解说体系,绝非轻而易举即可触动的。人们也许不难从这个体系中找到某一个突破口,不过当你想由这一点出发而从这个体系中走出时,你将不难发现,几乎处处都有一套分支解说系统挡路,使你难以脱身。因而只有经过由微观而宏观、又由宏观而微观的反复研究,切实把握传统解说体系在历史中形成的原委,并形成一套与之不同的相应的解说体系,然后才有可能突破传统解说体系并取而代之。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此书选收作者历年所作论文13篇,每篇都以传统解说体系的一个分支系统为对象,都是独立的学术论文。但又彼此呼应,形成完整的论证体系,并辅以地图34幅,地名索引533条,以便读者检索。所以,这实际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学术专著。以下就按照此书的论证层次来简介一下作者的解说体系。

第一部分,包括《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和《楚都何时迁郢》等3篇论文。流行说法以为古文献中之“江”专指今之长江。如果竟是如此,则楚郢都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后继城市江陵城,顾名思义,就也应临近今长江。而现今江陵及城北的纪南城遗址又皆符合临长江的地理条件,从而流行说法定楚郢都及江陵城于此,遂亦成为当然,对此,作者在前两篇论文中以近20条的史例证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今长江之专称,而亦可用以指淮水、汉水、沂水,以至汉水中游的支流蛮河(古沮水)等,甚至古文献中的“长江”,其上游也往往是指汉水。“荆江”在唐人诗赋中,亦非指今之荆江,而是指的汉水中游,而现今长江之荆江河段在唐及北宋时却被称为“蜀江”。《楚都何时迁郢》一文,在《世本》武王迁郢说,与《史记》、《汉书》文王元年迁郢说之间,作者取《世本》说,并考定楚都迁郢当在楚武王38—42年(公元前703—699年)间,从而对发生于楚武王统治的最后10年里(止于公元前690年)涉及楚都的史事,在地理形势上得以澄清,并为作者提出的丹浙说与宜城郢都说扫除了某些历史地理上的障碍。总之,这3篇论文虽尚未接触到楚郢都地望的核心问题,但是所论却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不能缺少的前提。

第二部分,包括《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邓国、邓县考》、《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与《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浙附近补证》等4篇论文。第1篇结合考古材料中的曾器铭文及其出土地点,与古文献中关于随国的记载,从地域、时代、族姓三方面说明“曾”与“随”为一国之二名,并在论证过程中有力地否定了一向被流行法定在随国西邻的姬姓唐国,认为唐不可能也在随枣走廊中。(关于唐国当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的详

考,另见此书第360—366、375—376页)。此外,本文也考定了随(曾)国都城当在汉魏随县故城,即今随州西北14公里的安居店北、澁水东岸,而非如流行说法所定在南北朝以来的随县城址(今随州市区)。凡此,将能为考释楚丹阳与郢都故址所在,创造一些条件。第2篇论文否定了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之说,又在已有的古邓国在今襄阳西北或东北等说中,确认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为古邓国所在。《左传》桓公九年曾记巴、楚、邓之间的外交与军事活动。确定了邓国地望,也有助于推证楚丹阳地望(参阅本书第122—123页)。第3、4两篇在前二篇的基础上进入了直接考订丹阳地望的研究领域。前人关于丹阳所在,有当涂、秭归、枝江及丹浙诸说。其中,当涂说证据薄弱,信者不多。具有竞争力的是枝江(或先秭归后枝江)说与丹浙说。作者一面论证古秭归非今秭归(参见本书第179—180页)、古枝江非今枝江(详考见本书第236—241页),一面又据《左传》、《国语》、《史记》,列举四项论据,说明西周后期与春秋初期之楚都丹阳应在丹浙地区(见此书第182—184页);而且又从《山海经》中发现丹浙附近还有更古老的荆山,足以配套。至于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阳,作者推测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我认为,作者所举四证,是难以驳倒的。如无切实的考古证据,恐难否定此说。作者根据周初的周楚间关系密切、商县地区多楚山、楚水地名以及丹江上游在考古文化上与中原的接近,推测周初丹阳可能在商县,这也具有启发意义。一般说来,秭归、枝江为丹阳之说与今江陵纪南城为楚郢都之说是易于配套的;而作者对于商县——丹浙为丹阳之说的论证,则为其以今宜城楚皇城为郢都之说准备了条件。

第三部分,包括《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云杜绿林故址新探》、《齐梁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郢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郢都、汉宜城县》、以及《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等5篇打主力战的论文,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解,并已根据一些相关地名的定位,从外部条件对古郢都、江陵当在汉域今宜城县南境,作了有力的推证。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自然更多,因而作者的论证也就更缜密。

第1篇论文考证古竟陵城故址问题。古竟陵在古郢都江陵以东,史有明文。自唐以来,关于古竟陵城地望始终有郢州长寿县(今钟祥)南,与复州竟陵县(今天门县北)二说。郢州说较古,但复州说则正位于长江边江陵城与纪南城遗址以东(偏北),彼此较易配套。因此,由唐至清,复州说渐占上风。作者则根据《隋书地理志》证明复州之竟陵是北周时由霄城县(六朝时与古竟陵县同属竟陵郡)改称,非古竟陵县所在,从而排除了复州说,又据宋版《左传》杜注竟陵县西有白水,西南入汉的记载,结合《水经注·沔水篇》关于巾水西迳竟陵县南的记载,推证巾水必然西入白水,从而订正了今本《水经注》记巾水入扬水(在汉水西)形成自相矛盾之误。“扬”当作“白”(参见本书第134页)。作者指出,今钟祥县南境、汉水东岸并无与白水、巾水源流与方位相当的水道;只有在县北近宜城南界之丰乐河流域可以相符,从而又否定了郢州长寿县南之说。更举合其他史事例证(特别是唐宋著名诗人皮日休明言其祖籍为襄阳[郡]之竟陵)及考古调查(参阅本书第139—146页),确定了古竟陵城,只能在今钟祥县北境,从而与古郢都、江陵在今宜城南境之说正好配套。

第2篇论文考证汉云杜县及绿林故址。首先依据《后汉书》几处明显记载,确定了绿林起义根据地在汉云杜县境,推翻了唐以来盛行的当阳说。然后依据一系列六朝古注,结合绿林起义的军事地理形势,确定了汉云杜县当在今京山县西北境,否定了唐以来占上风但与绿林地望(在京山县北、太阳山)完全合不上的、定古云杜县在今湖北仙桃市(旧沔阳县)境内的流行说法。最后联系到古云杜县之定位将为探索先秦至汉初的楚“云梦”地望奠定基础,楚云梦即《左传》宣公四年所记郟(亦作郟、云)国之梦(杜注:在江夏郡云杜县境)与《禹贡》之“云土〔‘杜’之简写〕梦”。《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东有云梦之饶”。云梦在汉晋云杜县境,约相当于今京山、钟祥二县交界地带,则正在今宜城南境楚皇城遗址以东(稍偏南),与上引《史记》所述正合。作者由于将另有《古云梦泽研究》专著问世,故此书未收入有关云梦的专文,仅略见梗概于本书《自序》中(参阅本书第29—34, 52, 169页)。

第3篇论文主要考订古沮、漳二水的源流。二水位于楚郢都及古江陵城近傍,在古荆楚中心地带。作者抓住汉魏六朝时一系列有关古沮、漳源流的记载作为基点,重新进行探索。首先确证古漳水源之古荆山在今南漳县西北,由唐至清初皆有记载。古沮水主源所出之景山则应位于古荆山西(偏南)今保康县东,近南漳、谷城交界处的三尖山。然后依据地形与流向,推定古沮、漳二水必然经宜城南境流入汉水,因而就只能是在今蛮河流域。文中还引证了自唐至清的记载中反映出古沮漳入汉、及今蛮河仍有“沮”或“漳”之称的一系列例

证多达10余条,进一步加强了论据(参见本书第219—224页),更进而选定了沿古沮、漳的五个城邑,逐一重新定位,综合运用古文献、考古调查及地理考察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得出一系列新解。总之,先秦至齐梁之古沮、漳源流及其所经城邑之间的相对方位是一整体。同周、隋以至近世的今沮漳河显然不是同一水系。古沮、漳既是今蛮河流域,则齐梁以前,位于古沮漳下游的楚郢都、古江陵城自不能出今宜城县南境。

第4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否定自唐以来已流行千余年的,认为古郢都、宜城在今宜城县南之说。首先排除了县南15里的楚皇城遗址之可能性。作者指出,遗址下限只到东汉,而古文献中的楚郢都、古宜城县下限则一直延续到刘宋前期,相差200余年,显然不合。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条论据:据《水经注·沔水篇》,秦将白起决郢水灌楚郢都,水入西门,“溃城东北角”而出;另记木里沟水自郢水引出,北流经宜城东,东北入沔水。此亦可证城东北地势偏低,故可引水为沟渠,这同上述“水溃城东北角”的描述正合。而据作者实地考察,楚皇城遗址却是东北部地势较高,向为当地人避水患之所,与上述《水经注》所记又显然不合。这也足证楚皇城遗址非古郢都、宜城。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着重从正面重新考定古郢都宜城以及流经城南的古郢水位置。为此,必须先从外围解决一系列相关地名的重新定位问题,因为这些地名一向被流行说法摆错了位置,必需层层突破,消除这些张冠李戴的障碍,才能为古郢都、宜城的最后定位,开辟道路。于是,作者先从古中庐城入手,经过细致的考证,确认其必应位于今襄阳城西的泥咀镇,而非如流行说法之定在今南漳东北;而流经中庐城南、东入汉水的古维水,即今襄阳西南境之鹤子川,而非如清人所云,为今之潼口河。古郢水、涑水都发源于古中庐县境。涑水下游又流经古郢县北境,实为襄阳城南的襄渠水;郢县则应在今襄阳县南境之欧庙镇,而非如流行说法之把二者都挤在今宜城县北、潼口河南的狭窄地带。把这些错位多年的古地名复原之后,作者就得以在此基础上抓住唐初的《括地志》和中唐的《元和志》关于楚郢都、汉宜城县在唐代的率道——宜城县南九里的关键性记载,先弄清唐宜城县及其前身率道县的位置。通过唐宋宜城县俗称“大提城”这一线索,理出了刘宋至北宋700年间的大提城沿革及宜城县南迁今址的大致时间。经过曲折复杂的层层探索与突破,结合实地考察遗迹与访求民间传说,更依靠了某些被忽视的珍贵史料(如嘉靖《宜城县志》)以及有力的旁证材料(如唐宜城县位于上考汉郢县境,明清时襄阳、宜城间里数比唐及北宋时多30里左右等等),终于得出唐率道——宜城县在今宜城县北30里的小河镇东北7、8里之羊枯汊(现已讹为“杨[洋]湖汊”)稍东处的结论。此地已在今汉水东,但却是古汉水(约在今汉水的小河镇至宜城河段以东4—7公里不等,故迹颇存)以西7、8里处,与《元和志》所记(古)汉水在(唐)宜城县东9里(唐里,略小于今里)亦正合,从而初步认知古郢都、宜城应在今宜城县北20里外。最后,针对流行说法误将古今郢水合一、以今蛮河为古郢水的情况,对古郢水地望也进行了重新探索。结合地形、发源地(古中庐西山,今南漳东北、与襄阳交界之七里山)、流向(东南流),推定其上游必是今潼口河上游之石河,更从六朝人对“柢中”(古郢水所经)地望及宋人关于木渠上源为古郢水、又在长渠(上源为今蛮河)以北等记载,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古郢水下游为今潼口河,由于古汉水东摆,而得以延伸东南流入今汉水河床约七八里,转东又数里,入古汉水。古郢都、宜城当在此延伸东转后的古郢水下流北岸,正当唐率道宜城县南约七八里处,方位全合。至此,古郢都、宜城以及古郢水在今宜城县南的一切可能性遂皆排除,并可同古沮漳为今蛮河、古郢都、江陵在今宜城南境的新解,彼此配套,相得益彰。

第5篇论文考订春秋晚期吴师入郢进军路线及楚昭王自郢奔随的路线。这就把作者所主张的以今宜城楚皇城为楚郢都之说,与其对荆楚地区一系列古地名的定位考证结合起来。作者重新考定了吴师入郢路线的关键地点为豫章、唐国、冥阨,以及大别、雍澁、清发、柏举等战地,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说法的一系列新解,指明一条由淮河流域西入南阳盆地,经唐国、南逾汉水,直下郢都的合理军行路线(参阅本书第373页图23,390页图25);同时,根据六朝时学者对于成臼、云中、郢等地的原有古注,经过考证、定位,也指出楚昭王奔随的大部分行程实未出古竟陵县境,这也是一条较为近便、合理的交通线。而这两条交通线的衔接点——楚郢都和古雎(沮)水,其位置又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

以上5篇论文,论证了古郢都、江陵外围的关键地名所在。还有一些关系密切的重要古地名如云梦泽、巫、巴、黔中、夷陵、秭归、夏口以及六朝时的南平、天门、宜都、建平等郡地望的研究与定位,皆未能收入此书,但是在《自序》中也作了相当详细的摘要介绍。可以说,至此作者已将他所需要论证的古郢都、江陵周围地区的有关地名定位问题,基本上理出了头绪。

第四部分，即此书最后的一篇长文《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这篇文章深入到作者所解决的古荆楚地理问题的核心，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的地望问题。由于自《括地志》以下的文献都以楚郢都在今江陵县北，而江陵城北又确有一战国大城（周长15.5公里）遗址，现称“纪南城遗址”。城内文化遗存多有楚文化特征，城外又多楚墓，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就是楚郢都遗址。针对这种情况，作者首先指出，纪南城遗址，据考古学界判定，上限不早于春秋晚期，甚至更晚，这与古文献中春秋初期楚始都郢的记载不合；而其下限仅至战国晚期，这又与古文献中郢都后继城市江陵直延至东汉的记载不合。同时作者还指出，唐宋以来定今江陵城北纪南城为楚郢都的说法与先秦至齐、梁的一系列原始文献记载不合。在此文中，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证楚郢都在今宜城楚皇城遗址。第一，作者根据以上各篇文章考证结果，从周围地区重要古地名的地望推定楚郢都、秦汉江陵当在今宜城县南境蛮河下游北岸近汉水处，与楚皇城遗址位置正合。第二，作者根据对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调查结果指出，此遗址上限可至春秋初期，下限直至东汉，时代正与古文献中所记楚郢都、秦汉江陵相合，而且城市规模相当于汉代郡城。汉代这一带地区属南郡，郡城即江陵，战国时期的楚郢都应更大些，借考古界尚未作认真探究，但亦非无迹象可寻。作者还从当地民间了解到不少关于楚平王、伍子胥、楚昭王等事迹的传说，亦可资旁证。第三，作者追踪楚郢都的后继城市不放，从秦汉时的江陵又追踪到魏晋时期江陵城址的两次迁移：吴曾把江陵城从北岸移到南岸，东晋中期桓温新修江陵“城临汉江”（据《世说新语·言语篇》引盛弘之《荆州记》），但皆仍在今宜城县境、与汉江陵城相去不远。第四，作者又列举其他五项证据说明，楚郢都、秦汉至梁末的江陵皆在今宜城县南境。第五，作者指出，江陵城确已在长江边今江陵的时间上限在后梁肖督时期，而迁移的原因则为公元555年西魏攻陷古江陵并予以毁灭胜破坏的结果。不过，历史上并无江陵迁移的明文记载。作者列举四项理由（见此书第456—457页）加以说明，所说皆当时实际情况，于此不赘。第六，作者对于历年讨论中所提出的六个主要的诘难问题作了具体的解答。其中，前四条是对于文献中的问题的解答，后两项是对于考古界所提问题的解答（详见此书第458—479页，此不备述）。其中最要者，看来莫过于对今江陵城北“纪南城”的解释，因为这个一是巨大的古城遗址，不能无一交代。作者根据遗址文化面貌与周围楚墓（最高级别为中等贵族墓）特点以及其年代上下限，推定它是战国时期楚国为开拓长江以南地区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陪都。这样，作者就基本上完成了他对古代荆楚历史地理的解说体系的陈述。

石泉教授对于古代荆楚历史地理的这一套新的解说体系，从其论证过程来看，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当其论证成果已经产生并被用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就又可使人收简明之效。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做到了两点：一，他把楚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大江之滨北移到汉水中游今宜城一带；当然，他承认战国时期楚国势力的向南发展，故以今江陵纪南城为楚于战国时期据以南进的陪都。二，他把与楚郢都关系密切的若干重要地点，从过去流行说法所认为的那种较为分散的遥远地区，相对地集拢于距今宜城不太远的地带。他的丹淅丹阳说与宜城郢都说（以及今江陵纪南城遗址为楚陪都说），以自己的研究指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发展、转移的情况。他的解说体系，由于对传统的解说体系有很大的突破，常常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但他所作的微观的细密考证已形成了一个系统。如果不能否定其所依据的全部主要资料，看来那就很难否定这个系统。其实，传统的说法也是有发展、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并非对传统说法单纯地否定或抛弃，而是对其中的发展的积极趋向有所继承和发挥。对于传统解说体系来说，此书确实是一突破；而对于历史地理学的传统本身，作者却又取精择善，实为有所批判的继承。

（二）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此书作者的研究方法。我以为值得说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地理沿革的连续性，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地理。

历史沿革地理，是一门艰难、复杂的学问。同一个地名，在古今可以表示远不止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在古今又可以有远不止一个地名。甚至在同一时间里，不同的地方可以有相同的地名，同一处地方又可以有不同的地名。这种十分复杂的现象，通常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如果能依据历史背景来追踪一个地名位置的变动，那自然是一种如实而可靠的方法。此书作者首先重视的也就是这个方法。例如，对于楚郢都，他向下追踪到其后继城市——秦汉时期的江陵，随后注意到三国时吴迁江陵与东晋中期桓温新建

江陵皆距原江陵不远，此后历宋、齐直到梁末，江陵城址更无变动。当他继续下追的时候，终于发现江陵在隋末唐初时已确实在三峡以外、长江之滨的今江陵附近了。迁徙发生于何时？史无明文。作者又对梁末至隋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他终于推定，原江陵城毁于被西魏攻破之后，迁徙发生于肖管建立后梁小朝廷之时。而且这一次距离较远的迁徙在历史上未能留下记录的原因，作者也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作了说明，在时空坐标上描成一条曲线，沿着这条曲线上推楚郢都的地望，当然就要比依据隋唐迄今的江陵去直接上推出郢都更为具有说服力了。除楚郢都、秦汉江陵以外，作者还对其他许多古地名都作了结合历史背景的连续追踪。应该说，这是一种可以减少以至排除研究者的主观任意性的历史主义的方法。

第二，对文献加以历史的分析，按其具体的历史的可据性分别加以应用。

研究历史以至历史地理，不能没有文献材料，而文献材料则因其作者与所记事件的关系远近程度而分为不同类别，一般以关系最直接者为最胜。凡此皆为史学工作者所共知。研究古代史，由于传留文献不多，原始材料难得，乃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其近古者为佳。这也为学者所公认。不过要在研究实践中贯彻好这些人所共知的原则，则又远非易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古代文献佚失者虽多，流传者亦不少，加之种类繁多，层次复杂，所以古文献学本身即相当艰深。此书作者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一方面颇见功力。

作者经过精心探研，把有关古代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分为作于先秦至齐梁与作于唐以后的两大类。因为他发现，两类文献所记之间有矛盾，而每类文献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却可大体相通。他不是象一些学者那样力图调和其间的矛盾（自郑玄以下，我国学者颇有调和、弥缝异说的传统），而是清醒地承认它，分析它，以求说明它的所以然。这是一种冷静而严肃的态度，当然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作者研究古代荆楚地理，自然以梁末以前文献为根本依据。当他研究楚国地理时，首先依据先秦文献，然后依次考察汉晋以下学者的解说。当他向下追踪楚国古地名时，追踪至某一时期，即尽量以某一时期文献为探讨之依据。他看来有一种遵守文献学的“纪律”的自觉意识，不大给自己留下随意的余地。他的这种意识，在面临历史上的一些大权威的时候也无所改变。例如，郦道无疑是古代地理学的一大权威，他认为汉代南昌的豫章城就是春秋时期的豫章。作者承认郦氏的贡献与权威，但是对于郦氏的这一说法，在书中甚至没有提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引用并讨论了杜预对于《左传》中豫章的注文。论年代，杜预魏晋时人，郦道元北魏时人，二人虽然都在南朝梁元帝败亡以前，但杜比郦更近于古；论资历，郦氏固地理名家，但未曾至南方，而杜氏兼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于一身，并曾都督荆州诸军事，规划平吴之役，熟知荆楚情状。唯其如此，作者在既经引用并讨论杜预之说以后，不再涉及郦道元之说，不但不为粗忽，而适足以说明其应用古文献之精审。

第三，对于有价值的文献，亦非一般笼统地肯定其价值。凡发现其中有矛盾处，必考之以文献，核之以地理，明辨是非，以定取舍。

《水经注》本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但是中经窜乱，讹误亦复不少。作者重视它，引用它，同时如实指出其中矛盾，进而明辨其是非真伪。例如，《水经注·沔水篇》云：“沔水又东南与阳（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以下历言扬水东北流、北流，经过楚国许多重要地点，东北流入（汉）沔水。关于扬水的流向流程，只从文字上是看不出问题的。作者却按地形核出了其中问题。他说：“现在的江陵附近地区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江陵以北的水道都是东南流。而今本《水经注》所记扬水流向却是由长江边的江陵往东北流，一直流到当时的竟陵附近入沔水。这在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扬水由江陵附近流入沔水，这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一致，应可信。问题则在于水流方向。今本《水经注》记扬水流向，称‘又东北’者五次，‘又东’二次，‘又北’四次，‘北’字凡九见！看来这正是后人依据后代的地理知识而窜改或订补了《水经注》的一条例证”（见此书第132—133页）。在这里，作者考之以《汉书·地理志》，核之以实际地形，无可辨驳地证明《水经注》今本所记扬水流向是错误的。那末《水经注》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作者据地形（而非据其他文献）指出，此段中的“北”字都应改为“南”字，扬水只能按地形东南流入汉水。而“北”字改为“南”字以后，扬水的源头就不在今长江边的江陵附近而在今宜城南境的江陵了。这样就正与作者的宜城古郢都说相应（见此书第148页）。此外，作者还指出今本《水经注》中多处问题，如：巾水入扬水（当为入白水）之误（见此书132—134页）、漳水流向之误（见此书235—236页）、枝江地望（当在今蛮河入汉处）及其与江陵的相对方位问题（见此书338—339页）、关于中庐方位的记述之自相矛盾（见此书260—264页）、涑水与襄阳湖水（襄水）误分为二（见此书275—276页）、《江水篇》与《沔水篇》关于江陵及相关城邑记述之矛盾（见此书460—463页）等。

作者所用的方法都是考之以文献、核之以地理。前人校书，多在文献与版本上下功夫；校地理书，也多纸上谈地。作者所用的文献与地理的双管齐下的考校法，看来也是对长期的传统方法的一个突破。

第四，重视以文献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的契合，重视实地调查。

作者是长于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而非考古学家，但是他十分重视以自己的文献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的契合。面对今江陵县北纪南城这样一个大城遗址，作者当然知道考古成果对于判断它是否即楚郢都的重要性。作者不怀疑这个遗址的确具有都城规模，但是他认为，如果说它就是楚郢都，那还要其考古材料能与文献中对于楚郢都的记载相契合。据文献，楚郢都上起于春秋初，下迄于战国末，而其后继城市秦汉时的江陵则下至东汉。而迄今对于纪南城时代上下限的考古学上的判断是：初建城邑不早于春秋晚期，扩建为都城规模不早于战国中期，而下限则仅至战国晚期。也可以说，作者是凭借了考古学上的器物断代的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当然这主要是凭借其与文献的契合。对于宜城楚皇城遗址，作者同样也考虑到了它的时代上下限与有关文献记载的契合问题。为了弄清楚郢都遗址所在，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曾一再到宜城及蛮河址流域一带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依据各种有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既作地形地貌的观察，又作遗址与文物的调查，还了解民间对于古迹的传说。作者所重视的仍然是多方面的资料相互印证与契合。

第五，在历史地理考证中重视逻辑的合理性与实证的合理性之契合。

通观此书自序及各篇论文，可见作者所着意追求的就是逻辑的合理性与实证的合理性的统一。从作者的研究过程来看，他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是从40余年前探讨春秋时期吴师入郢路线开始的。当时他“对于流行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疑向，感到那种说法在情理上和史料上都是矛盾百出，很难讲得通”（见此书第10页）。这就是说，他的研究真正是从发现传统说法缺乏逻辑的合理性开始的。对于逻辑的合理性的要求，使他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并明确了问题探讨的方向。但是，仅此一点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他作了具体的探究与考证，以实证的资料为根据，提出了自己对吴师入郢路线的新解说。于是，在这一个问题上，他达到了逻辑合理与实证合理的结合。可是，传统说法既然是一个体系，事情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能触动唐以下对于古荆楚地理的解说体系，那末作者对于吴师入郢路线的新解说（尽管有其自身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一旦置入整个传统解说体系之中，就又必然缺乏逻辑的合理性。于是，作者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里不断地追求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结合，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作者自己的新的解说体系。四十余年来，作者的研究过程，可以说是不断追求两种合理性结合的过程。而作为作者的研究成果，此书所呈现的对于古荆楚地理新的解说体系，也体现了作者所要求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契合。作者对于楚郢都以及与之有关的各主要山川湖泽城邑关隘的位置都作了重新考证，达到其各自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结合，然后作为一个总体，从各地名间相对方位、距离的关系来看，又达到其逻辑的合理性。其实，作者对自己的解说体系之所以自信，关键也就在于此。作者在自序中说：“迄今为止，我对自己提出的新解是有信心的，而且日益增强。这并不是出于主观愿望，而是在探索中逐步树立起来的。一系列的新解释都是积累了经过考订的原始材料之后，加以分析比较，找到了材料之间的内部联系，终于呈现出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最初往往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竟会是这样！但这又是无可否定的逻辑必然。只能沿着这条新辟的蹊径，按照科学的要求，继续走下去”（见此书第3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作者的这一段话，如果概括起来，就是追求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结合，服从这二者的结合。如果他的新解不遇到在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这两方面无法反应的挑战，他自然要沿着他自己走出的路走下去。

从以上情况看来，此书不仅由于对古代荆楚地理提出新的解说体系而有其重要成就，而且也由于其研究的方法能给予人们以启发。作为一部有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此书当之无愧。

关于此书的不足之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此书所收论文，篇幅大都比较长，长者达数万言，涉及问题也比较复杂。可是，各篇文章之前皆无内容提要，这于读者殊为不便。希望在再版时能够补上。

（二）梁末至唐，是作者所说的荆楚地区地理沿革变动巨大的关键时期，在此书中对此已有一般性的论述，而作者所拟撰写的《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理形势之巨变》专文未能及时写出收入此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美中不足。希望再版时能够加入此篇。这将使作者在此书中陈述的对古荆楚历史地理的新解说体系更为完满、充实。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